

台湾作家琦君的生母是瑞安人

■黄国宏

1998年,82岁的琦君在台湾出版《永是有情人》,首次披露自己的身世之谜——“数十年来,我笔下的母亲,其实是对我天高地厚之爱的伯母,我一岁丧父,四岁丧母……”那么,琦君的亲牛父母,又是谁呢? 笔者走访发现,作家琦君的牛母原来是瑞安人。

她认定自己是温州纸山的女儿

琦君,原名潘希真,小名春英,出生在温州纸山(有水雕造纸的崎云山脉两侧,历史上包括瞿溪与湖岭)的瞿溪庙后村,台湾女作家、散文家,师承“一代词宗”夏承焘。其文字至纯至美,情怀至真至善,曾被誉为“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

很多大陆读者熟悉琦君,是从周迅、黄磊、归亚蕾领衔主演的电视剧《橘子红了》开始,这部家庭伦理剧改编自琦君同名小说。

关注中国近代文学史,笔者发现凡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出生的人,由于国难当头,战火频仍、动荡不安,其人生命运都比较坎坷曲折。风暴雨连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多少人由于历史原因,只能在陌生的土地上郁郁而终,终生魂萦着自己童年的故土。

出生于1917年的琦君也不例外,从纸山、到瞿溪、到杭州、到上海、回瞿溪,去台湾、去美国、回瞿溪……她半生飘零,但精神原乡和写作灵感从不曾离开故乡半步,在《留予他年说梦痕》中她剖白:“像树木花



草似的,谁能没有一个根呢? 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不再笑,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

82岁披露身世之谜

生母奄奄一息中,把哥哥和我这两个苦命的孤儿托付给伯母,是伯母含辛茹苦抚养我们兄妹长大。”

原来,养育她成长的“潘师长潘鉴宗”与“潘师长原配夫人叶梦兰女士”是她的伯父伯母。

那么,琦君的亲生父母,又是谁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前段时间走访了如今归属瓯海泽雅镇的庙后村。在村民的帮忙下,笔者看到了与琦君有关的族谱。

从族谱上看,潘鉴宗(北洋政府时期曾任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出生于1882年,他有一个亲弟弟,名叫潘鉴卿,出生于1886年,后来娶了瑞安朱山的卓氏(出生于1892年)。瑞安朱山,就是如今芳庄的卓庄(现纳入云溪村)。

卓庄族谱上的记载

琦君1917年出生后,她的生父潘鉴卿在1918年年底就去世了,享年32岁;而当琦君4岁时,她的生母卓氏也在1921年农历九月廿三去世了,享年29岁。

按照常理,我们可以推断年幼的春英应该跟随生母去过湖岭卓庄,看过亲外公卓三梅。

从朱山到庙后,走路翻越琦云山脉大约1个来小时。

我想象不出,那位来自湖岭朱山的卓氏,临死前把6岁的长春与4岁的春英两个幼小孩子托给姑妯娌时,内心该有多么不舍、多么担忧、多么悲切!

由于重男轻女等原因,我在族谱资料里查不到湖岭卓氏的名字。

琦君,从血缘上讲,就是纸山的女儿。不过4岁以后,就由伯母伯父抚养长大,所以,她对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没什么印象的。无怪乎她的笔下,难觅亲生父母的痕迹的。

1927年,潘长春跟随伯父潘鉴宗在定居北京期间,患病去世。2006年,潘希

琦君文章中的纸山口头语

在《妈妈的菜》一文里:“母亲常生气地说:‘你这孩子,真是有福不会享,有被子盖蚊帐,妈妈吃的都是剩菜呀。’”

《粽子里的乡愁》:“我最最喜欢吃的是灰汤粽。那是用早稻草烧成灰,铺在白布上,拿开水一冲,滴下的热汤呈灰褐色,内含大量的碱。把包好的白米粽浸泡灰汤中一段时间(大约一夜晚吧),提出来煮熟,就是浅咖啡色带碱味的灰汤粽。”

《灯影旧情怀》:“每回地方上举行什么大典,或是左邻右舍办喜事,我就会蹦得半天高地喊:‘我真爽显爽,我爽得都要爆裂开来了!’‘爽’是我家乡话‘快乐’的意思,‘爽显爽’就是‘快乐得不得了’啦。”

上面列举的这些俗语,不都是湖岭人的口头语吗?

诗人白居易在《初出城留别》写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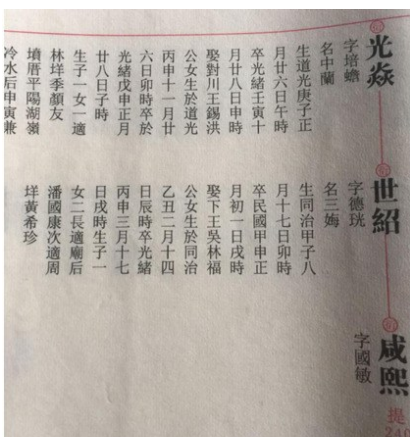
琦君的文字,读得越多越能发现:母亲与故乡,在她心中,早已交相融汇,不分彼此。无论一生走到什么地方,身份如何变化,她认定自己永远是故乡纸山的女儿。



家族合影

婚后,卓氏于1914年生了一个儿子,叫潘长椿(春),1917年生了一个女孩,取名潘春英。这个叫潘春英的,号希真,就是后来的大作家琦君。

所以说,琦君的亲生母,就是瑞安市卓庄的卓氏。



族谱

真(琦君)在台北市去世。

那天下午,独自驾车回来时,竹林遮天蔽日、早春的太阳穿过竹林隙缝,在柏油山路上洒下斑驳的影子。崎岖的山路上寂静一片,车外只有沙沙车轮摩擦声。而此时的朱山,我寻找的那位历史人物,在她的家乡只剩下一个姓氏与一片轮回了数千年的竹林。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这也是琦君一生的心路历程,失去了故土家园的女儿,用文字构筑了心灵故乡,为我们带来滋养人生的力量,启发我们在阡陌红尘中,找到自己最心安的生命家园与灵魂归宿。

【瑞安文物散记】

垟坑石塔

■万锡春

宋代是中国佛教信仰盛行时期,浙南地区佛教的传播更为流行。宋人为表示信奉之诚,往往借机写经造像,修造塔庙,浮屠营造蔚然成风,垟坑石塔就是在这—历史背景下兴建起来的佛教建筑。

垟坑石塔坐落在仙降街道垟坑村西隅的一个小山包上,其南前方约300米处的山麓上有宋代史迹——悟空寺。

据民国《瑞安县志稿》“古迹卷”记载:“暘坑(垟坑原名)石塔在仙降暘坑悟空寺前,宋熙宁三年(1070)建。”又据《瑞安县志稿》“宗教卷”悟空寺条记载:“悟空寺在暘坑,原称院,后晋开运二年(945)建院造塔,宋祥符间赐额。”据此垟坑石塔应属悟空寺之佛塔。在石塔第一层南面檐柱上刻有“熙宁四年(1071)辛亥九月戊戌朔初六日丁亥故书于耳”题记。据题记和石塔的建筑风格,垟坑石塔应建于宋熙宁年间。1982年垟坑石塔被列为瑞安市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垟坑石塔为仿木构楼阁式实心塔,全部由石质材料建造,平面呈六边形,高九层。由台基、基座、塔身、塔刹四部分构成,第一、二层之间原筑有木构副阶,现已坍塌,塔身上尚存搭建木构副阶用的凹槽。在塔身每层的平座上发现有安置勾栏用的方形榫眼,可见石塔虽为实心塔,不能登临,但在塔身的平座上都有起着装饰作用的护栏。塔整体外形各层宽度基本相等,一反宋时塔身部分逐层收缩的建筑风格,塔体修长,出檐深远,起翘舒缓,外形轮廓刚直挺拔。

整座建筑全由石材凿刻成各部件后,干摆叠筑而成。石塔下部的台基建于一座高约六米的小山包上,依小山坪的自然地貌,用大小不一的石块垒筑成不甚规则的六边形,台基上筑基座。基座由土衬、须弥山和须弥座组成。土衬用花岗岩石块筑成六边形,稍大于须弥山。须弥山用花岗岩石块筑六边形,其六边壁面上满刻海浪纹,寓意佛教中“九山八海”。

须弥座平面呈六边形,自上而下依次为上枋(即第一层平座);上枭;束腰,每面中部凿出壶门,内浮雕护塔神像一尊,共六尊,神像身披铠甲,手执法器,神态肃穆;下枭,其下刻出皮条线;下枋;圭脚叠涩两层,下层稍长于上层,下层底部用剔地法雕饰蝙蝠状琴脚式底座,立于须弥山上,自须弥山至平座上皮总高142厘米,上立塔身。

塔身用叶腊石建造,每层由平座、正身、腰檐构成。檐下饰斗拱,除第一层为木构副阶,正身为素面外,各层每面结构型制基本相同。

平座每面用长条石雕刻成叠涩两层形式,每面平座上凿有三四个安装木勾栏用的榫眼。

正身(座斗至平座部分)六面,每面用一块叶腊石板雕刻而成。转角处刻出六边形倚柱,隐出三面,两倚柱间刻出阑额和两檐柱,将每面划分为三间,明间辟有壶门,内浮雕佛像一尊;左右两次间各刻有纵二横三,共六龕小佛像。

腰檐刻出檐子、椽子、筒瓦、勾头及仔角梁和老角梁等仿木构细部构件。檐子起翘舒缓,出檐深远,椽子刻成方形,勾头雕饰菊花纹,老角梁呈圆形,其上压仔角梁,檐角平面呈箭头状,仔角梁前端下方凿有系风铎用的圆形洞孔。

腰檐下置斗拱层,转角和补间铺作各用一朵,均为三铺作单抄偷心造,转角铺作向外出挑三个华拱下置圆形栌斗。

塔身刻像均用剔地高浮雕法,每面正身明间刻大佛像一尊,左右次间各辟小佛像六龕,每面共刻大小佛像13尊。佛像的服饰分两种,一为全披袈裟式,一为左袒式,均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神态安祥,手印丰富。其塔身遍刻佛像,现存刻像有三百多尊,按原九层塔身推算,应不下七百多尊,可谓“千佛之塔”,如此众多的刻像以及其雕刻工艺精湛,刀法娴



熟在佛塔中并不多见。

石塔的须弥座和第一层塔身上刻有铭文8处11条,约有860多字,内容大都为缘助营造石塔者的姓名和发愿文。铭文其中的一些人和事弥补了方志文献的不足,具有较高的地方史料价值。在石塔第一层南面的两檐柱之上刻有“恭为祝延今上皇帝州县官班六军万姓建兹宝塔”,“熙宁四年(1071)辛亥九月戊戌朔初六日丁亥故书于耳”,更正了《瑞安县志》中“暘坑石塔宋熙宁三年建”的错误记载,为石塔的建造年代提供了确切的依据。

塔的建筑材料有多种,木、砖、琉璃,用石材料建筑的石塔只是塔中的一部分。而石质材料有较强的抗自然侵蚀能力和防火性,因此使用石材料最为理想,事实上石塔的留存例,在各种材料的塔中也是最多的。利用石材料建筑的中国传统建筑中,建造高层建筑的石塔难度较高,不仅由于材料坚硬不易加工,最重要的是要保证高层建筑的稳定性。石塔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建筑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更是我国古代石结构技术发展到一个重要标志。只有石技术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建造出稳固的石塔才有可能。

唐宋时期浙南先民已具备了高超的石作工程技术和精湛的石刻艺术水平,从塔身的构筑可见一斑,石塔每面的正身用一块石板凿刻而成,在每块石板的一边刻出一根六角形倚柱,倚柱后侧凿有母口凹槽,另一边凿成约60度斜面,插入第二面正身石板倚柱的内凹槽,内侧用蚂蟥铁钉连结固定,扣合紧密,宛如一体。塔檐、平座每层均用六块石料凿刻拼合而成,上下层错缝叠压,起稳定作用,内部亦用蚂蟥铁钉连结固定。而且在石材的选用上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根据其建筑功能的需要,而采用不同质地和性能的石材,对承受全塔重力的土衬石和须弥山采用质地坚固的花岗岩;在需进行雕刻佛像、斗拱、梁柱的塔身部位,则采用质地细腻、易于雕琢的叶腊石;而对起遮阳挡雨作用的塔檐则采用质地坚细、抗侵蚀性强的青石。这些足以说明了当时工匠们对石质材料性能的认识和掌握已达到驾轻就熟的地步,反映了浙南先民高超的石作技能和精湛的石刻艺术水平。

悠悠千年,不知有多少遗构已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垟坑石塔存续至今,较好地保持着历史原型,弥足珍贵。垟坑石塔有别于中原地区佛塔那种雄伟宏壮的外形轮廓,而显得十分修长秀巧,刚直挺拔,使整座石塔轻盈典雅,给人以玲珑秀巧之感。这种刚直秀巧的立面造型,为佛塔中所罕见,是浙南石塔有别于其他佛塔的一大特征。她忠实地反映了宋代浙南佛塔的建筑形式和石刻艺术水平。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先生对垟坑石塔进行考察时,认为:“垟坑石塔全部用石板和石条建造,造型独特,式样美观,是宋代的一座重要建筑。”

